故宫博物院藏清初“赐本”陕刻《孔子庙堂碑》考 *

冯小夏

内容提要 清初“赐本”陕刻《孔子庙堂碑》现藏故宫博物院。通过碑石断泐、拓本年代、版本和装裱等方面的考证，可知“陕本”《孔子庙堂碑》碑石宋元之时即已断裂，故不能排除有宋拓本存世的可能。故宫博物院藏“赐本”《孔子庙堂碑》流传有绪，应为明内府旧藏南宋拓本，其装裱形式为讨论库装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陕本”《孔子庙堂碑》 三段石 宋拓 库装

一 “陕本”《孔子庙堂碑》的刻立与迁移

1.《孔子庙堂碑》的初立及佚失

《孔子庙堂碑》(下文简称“《庙堂碑》”)，楷书，虞世南奉敕撰并书，唐贞观四年(630)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碑文记述了唐武德九年(626)封孔子第三十三世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葺孔庙事[1]。《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载，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此碑经历了改造或重刻，改造后的碑石由相王李旦篆额。唐大中三年(849)，祭酒冯审奏请琢去额中“大周”伪号[2]。唐代关于《庙堂碑》的记录，止于大中三年改额事。同书大顺元年(890)条载[3]：

> 大顺元年二月，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奏，文宣王祠庙经兵火焚毁，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之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

彼时唐长安孔庙确因火毁，《庙堂碑》是否因此“消亡”，不得而知。但经历了唐末兵燹与迁都的长安城，国子监与唐、周时所立的《庙堂碑》皆遭到严重破坏，片石无存，则可见于史籍记载[4]。

---

*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晋唐宋元书画的价值阐释与保护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3ZD12)的阶段性成果。

‹1› 路远《碑林语石——西安碑林藏石研究》，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64—75页。

‹2›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下)，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991页。

‹3› 前揭(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上)，第551页。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4›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90页。

〔图一〕宋王彦超再建《孔子庙堂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2. 京兆府孔庙与《庙堂碑》的重建

天祐元年(904)，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同年，京兆尹韩建对长安城进行了缩建‹1›，将原在唐长安城外郭城务本坊的国子监与文庙迁入长安新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2›。五代时期，国子监又改为京兆府文宣王庙。北宋建隆三年(962)，京兆尹王彦超重修孔庙，汇集《开成石经》，复刻重要碑石，并立《重修文宣王庙记》记其事‹3›。虞世南撰书的《庙堂碑》即重立于此际。

王彦超复刻的《庙堂碑》通高2.80米、宽1.10米，碑阳楷书34行，满行64字。碑螭首，篆额“孔子庙堂之碑”两行六字。碑侧浅浮雕线刻花卉图案，碑阴无字。碑座为后世所补立，非唐宋趺座形制。碑末刻“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京兆尹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王彦超再建”题记一行。按《宋史·王彦超传》载：“乾德二年，复镇凤翔。”‹4›因此，重建的《庙堂碑》当落成于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即962至964年之间。《庙堂碑》在历史上有多种重、翻刻本，由于此碑立于陕西西安，故称“陕本”“西安本”；又因其与世称“东庙堂本”的山东成武重刻之《庙堂碑》(现存山东省成武县博物馆)相对，亦称“西庙堂本”〔图一〕。

3. “陕本”《庙堂碑》的迁徙

北宋景祐三年(1036)，知永兴军府事范雍

‹1› (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2› 路远编著《发现陕西 走进西安碑林》，未来出版社，2014年，第11—13页。

‹3› 此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三《重立文宣王庙碑》，王昶按语：“……(韩)建筑城时，经石委弃于野，刘邠始辇入城。而碑则云韩公居守，遂移石经，彼此互异。”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民国十年石印本，1990年。

‹4› 《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8912页。

于现西安文庙处建京兆府学，“陕本”《庙堂碑》即在此处。北宋时期，京兆府学与孔庙曾有两次迁址，“陕本”《庙堂碑》亦随之搬迁了两次[1]。

据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记载，北宋元丰三年(1080)，京兆府孔庙与府学第一次迁址，系由“唐尚书省之西隅”搬出，迁入“府城之坤维”，坤维即城北。该碑又载，二十余年后的崇宁二年(1103)，京兆府孔庙与府学又从城北迁入“府城之东南隅”之新址，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所在地。自此，“陕本”《庙堂碑》即矗立于今之碑林，逾九百余年。

二　历代文献著录中的“陕本”《庙堂碑》

现在的“陕本”《庙堂碑》是断裂为三段后，经后世修复重立的。碑石断裂的确切时间，史籍中缺乏记载。了解“陕本”《庙堂碑》断裂的准确时间，以及宋金以后不同时期碑字损泐的具体考据，对于该碑拓本的断代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就此展开探讨。

自北宋至清代记录“陕本”《庙堂碑》沿革的文献比较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记述碑石状况或位置，另一类记述拓本，从而间接反映碑石状况。这些记述基本上反映了历史上“陕本”《庙堂碑》的残损及位移等情况[表一]，以下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表一] 历代“陕本”《庙堂碑》著录

序号	文献名称	著述时代	著者	《庙堂碑》情况	讨论对象
1	《集古录跋尾》	北宋	欧阳修	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	拓本
2	《云烟过眼录》	元	周密	京兆府本，无裂乃佳。	拓本
3	《类编长安志》	元	骆天骧	《庙堂碑》，今缺裂不完，在文庙。	碑石
4	《荥阳外史集》	明	郑真	此在陕右，名“三段石”，又名王彦超本。	碑石及拓本
5	《关中纪行》	明万历	王世懋	《圣教序》《夫子庙堂碑》皆断碑。	碑石
6	《石墨镌华》	明万历	赵崡	余尝至其处，见碑傍一片石，取视之，则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后人不复得见此书。	碑石
7	《肇域志》	清初期	顾炎武	在文庙，今缺裂不完。	碑石
8	《来斋金石刻考略》	清康熙	林侗	今在西安府学文庙戟门内东墀，与智永《千字文碑》对峙，碑已断，今续而竖之。	碑石
9	《秦楚之际游记》	清康熙	薛熙	(《石台孝经碑》)亭北为堂，三楹中通，往来左右，各竖碑三行。俱南向左一行，为《颜氏家庙碑》，颜真卿书；次为《圣教序碑》，王羲之书；次为《皇甫府君碑》，欧阳询书。后一行，为《夫子庙堂碑》，虞世南书。	碑石
10	《雍州金石记》	清乾隆	朱枫	《皇甫诞碑》，正书，今在西安府文庙棂星门内右首，与《庙堂碑》对。 王彦超再建，则元(原)碑已亡，此重刻也。今碑断为三，缺百余字。	碑石
11	《平津读碑记》	清嘉庆	洪颐煊	碑已裂为三段，又多剥落，不能全读。	碑石

‹1› 路远《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年，第23—35页。

1. 宋元时期即已“缺裂不完”

北宋之时，“陕本”《庙堂碑》即经历了从“无裂乃佳”到“裂缺不完”的变化。欧阳修（1007—1072）在《集古录跋尾》中最早著录了“陕本”《庙堂碑》[1]：

> 右《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并书。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谓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依欧阳修所记，该碑在宋天圣初年时尚算完好。二十余年后再见，已不再如初。自嘉祐八年（1063）的落款回溯十八年，即庆历五年（1045），彼时王彦超重建的“陕本”《庙堂碑》落成仅八十余年，便已残缺。元代文献中亦有“今缺裂不完”的记载。晚明安世凤在其《墨林快事》中也记录了一册宋拓“陕本”《庙堂碑》，称：“**余幼习此帖，亦宋搨本，但已经断折**，合缝处率差一行，以致装潢之家前后各不相中，几不可读。遍觅全本，了不可得。后细详文义，知其误，**由折处迹之，每行可失去二三字而已**……”[2]可作为佐证。

自宋至元，“陕本”《庙堂碑》经历了从“无裂乃佳”到“裂缺不完”的剧变。前人记述的“无裂乃佳”侧面印证了碑已出现贯通的裂纹，而“缺裂不完”则反映碑身不仅断裂，还有碎石掉落，不再完整。综上，“陕本”《庙堂碑》在王彦超重建的百年之间又再次断裂缺字，到元明之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2. 入明之前已有俗语称“三段石”

元末明初，“陕本”《庙堂碑》已经有了“三段石”的代称，见郑真《荥阳外史集》[3]所载，连篇累牍，反复考证，此处试举一例[4]：

> 虞永兴《孔子庙堂碑》传刻甚众，首题有大周者甚古。碑首系相王旦题，相王即睿宗也，武后尝立以为帝，已而被废为周王嗣者，九年为相王者。十年，武后易唐为周，相王题额用大周国号。唐既返正，碑遂去其角。后刻者皆仿是碑。盖永兴官著作郎时书撰，距武后大足、长安间逾六十年，安得相王书碑额耶？此必先有其人，至武后时重刻，因易以相王耳。予闻夏氏士良言之，虽未敢必然，亦传疑之义也。士良松江望族，好古博雅，旧时尝用白金五十两购一善本，来濠梁减原价三之二，以售天台戴颖仲。戴已谪死，嗣而守者其谁哉？每为惋惜。**此在陕右，为“三段石”，又名王彦超本**。较之古刻，实其曾玄，亦可以得八法之妙旨。张士信在吴，爱学虞书，多士慕效之。时陕右阻绝，若兹者视之，不啻宝玉。然则斯文之好，尚其亦在

‹1› （宋）欧阳修著，邓宝剑、王怡琳注《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2› （明）安世凤《墨林快事》卷五，清抄本，第8B—9A页。

‹3› （明）郑真撰《荥阳外史集》一百卷，其中三十卷明代已佚，其余存卷经校定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有文渊阁本印行。该书曾有五次提及“陕本”《庙堂碑》为“三段石”。除正文引述段落外，其余详见（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0、230、232页。

‹4› 前揭（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外二种），第234页。

上者，有以鼓倡之耶？**予客居，得南北刻数本，辄辨其所自出。因以得于夏氏语**，书陕刻后，以寄里友陈子云氏，并求教于乡先达君子云。时洪武十年五月既望，寓中都郑真识。

郑真，字千之，号荥阳外史，浙江鄞县人，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后入明，为一代硕儒。他反复提及的"陕右三段石"并非其亲自访碑得来，而是在客居明中都时，为辨识其所获《庙堂碑》的不同翻刻本，夏文彦告知他的。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兰渚生，《元史类编》《元书》均有传。好古嗜学，著《图绘宝鉴》。洪武二年(1369)被谪临濠(即明中都，其地属今安徽凤阳境内)，生活惨淡。与郑真颇有交游，《荥阳外史集》屡有提及[1]。"三段石"的记录真实可信，因为当时夏、郑二人，都可获见碑的拓本，与此相互印证。夏氏谪居窘迫，贱卖了重金购买的"陕本"《庙堂碑》拓本。而郑真反复五次提及"三段石"，都是为该碑拓本题跋。《荥阳外史集》中另记"适有自陕右来者，惠及虞永兴公《孔子庙堂碑》拓本，用以寄二子八法之妙，以永兴公期之"[2]，也印证了其获得拓本的来源及交流等情况。郑真于明洪武十年(1377)所作跋语，是目前已知的关于此碑断为三段的最早记录，比当下流行的碑三断于嘉靖乙卯(1556)关中大地震之说的时间，早出了近180年。

3. 明清两代的碎裂与位移

自郑真以后的二百余年里，文献著录罕有对"陕本"《庙堂碑》状况的更新。直至嘉靖乙卯关中大地震后，有关著录才逐渐丰富，如王世懋、赵崡先后在关中大地震后来到西安府学访碑，记录了明万历时"陕本"《庙堂碑》断折、倾倒及继续有碎石剥落的情形[见表一]。赵崡有所谓"见碑傍一片石，取视之，则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后人不复得见此书"的感慨。结果一语成谶，那片碎石如今指《庙堂碑》的哪一段，已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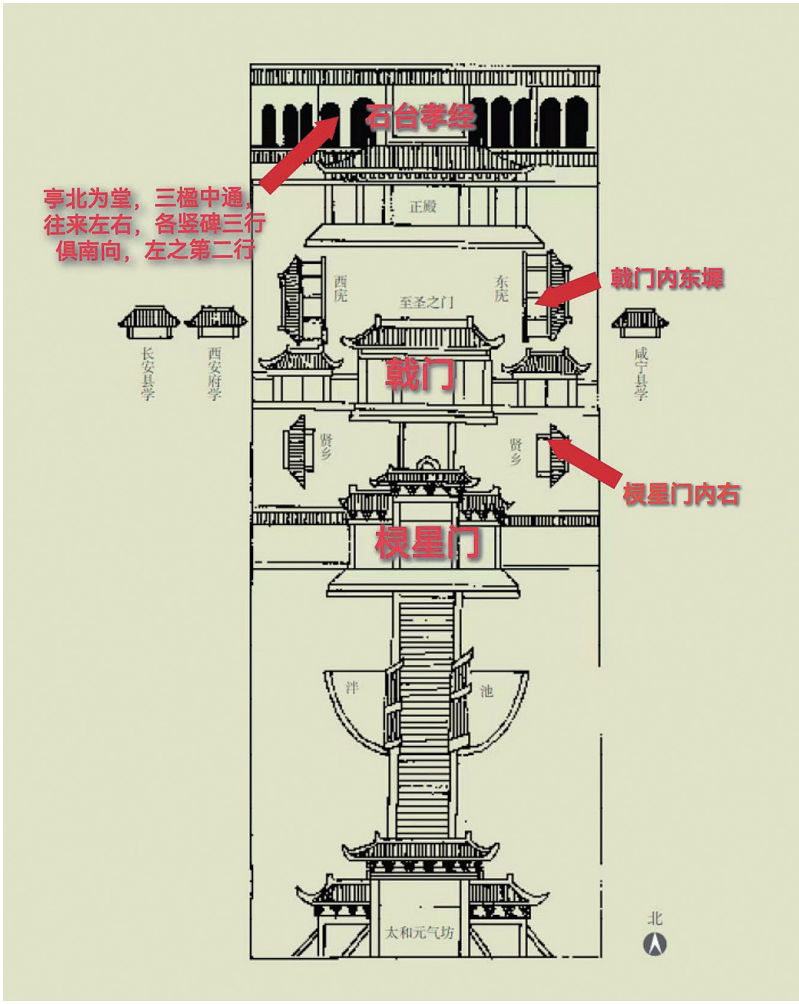
倾倒的"陕本"《庙堂碑》至迟在清初已被重新接续竖起。此后，该碑碑文虽多有剥落，但未再出现严重损伤。康乾时期，"陕本"《庙堂碑》与众碑石的存放地点时有变化，至少在文庙戟门内东墀、府学宫后《石台孝经》碑亭北侧和文庙棂星门内右侧三个不同的位置陈列过。位置的移动，当与明清两朝对西安府学的改造以及对碑林的维护修缮有关〔图二〕。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明成化十一年(1475)《重修西安府儒学文庙记》载："及殿后汉唐石刻之属，旧覆亭宇，咸增新之。饰以丹漆，加以藻绘，高卑大小举以发，无复昔时之陋。"据西安碑林博物馆路远研究员的统计，明嘉靖关中大地震后，整修西安孔庙的记事碑刻多达十一通，其中明代五通，清代六通[3]。清朝的最后一次整修为清乾隆九年(1744)，《雍州金石记》记录的应该就是这一次整修之后，碑林所藏汉唐碑刻的陈列情况。1920年再次整修时，碑石陈列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1930年出版的《书道全集》显示"陕本"《庙堂碑》仍在棂星门内右侧，并刊有其旧影〔图三〕。虽然照片只露出碑的上半部，但可看出，整个碑是嵌在墙上的。1944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 前揭(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外二种)，第23、24、560页。

‹2› 前揭(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外二种)，第182页。

‹3› 路远《西安孔庙历史溯源》，《碑林集刊》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97—109页。

〔图二〕清康乾时期“陕本”《庙堂碑》在西安府学中的位置移动示意图
底图采自（康熙）《咸宁县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成立，“陕本”《庙堂碑》才被移入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室[1]。

三　故宫博物院藏《陕本虞永兴孔子庙堂碑》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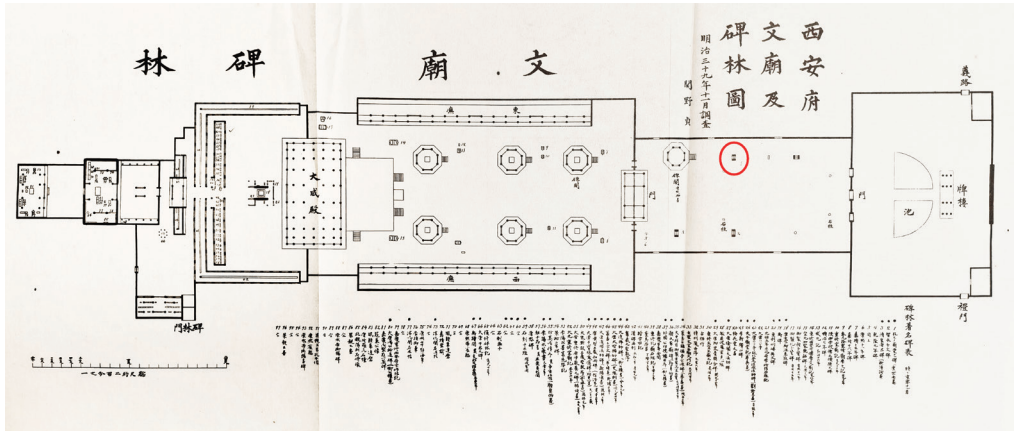
（一）基本情况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册《陕本虞永兴孔子庙堂碑》宋拓本（文物号：新46667，以下简称“赐本”）。浓墨擦拓，蝴蝶装，墨纸十七开半，白纸挖镶剪裱，裱边镶香色撞边。装裱每开纵42.5厘米，横56.5厘米；墨纸每半开纵28.5厘米，横16.3厘米。碑文在前十七开每开十二行，唯第十七开只十一行，最末半开为刻款，共五行。封面清张岳崧书外签，题“陕本虞永兴《孔子庙堂碑》，蔗田珍藏，觉庵题”〔图四〕。全册前后共有清代包世臣、宋葆淳、吴荣光、姚鼐、孙星衍等名家观款题跋十五段。前附页二开为白底洒金纸；后附页四

〔图三：1–2〕1930年代前后“陕本”《庙堂碑》旧影及其在碑林陈设位置示意图
采自［日］下中弥三郎《书道全集》第八卷，东京：平凡社，1930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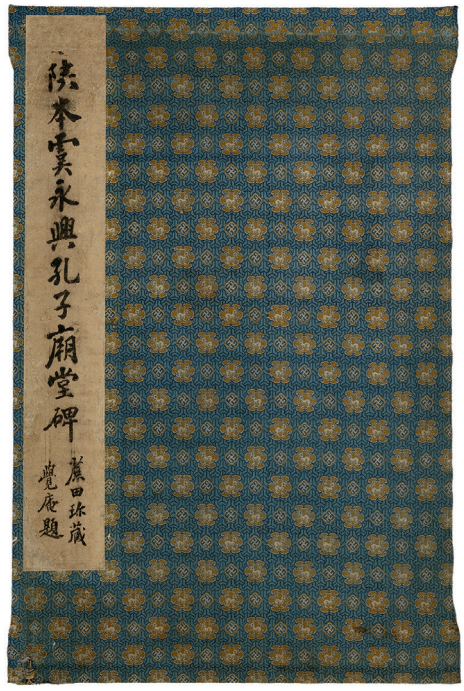


2

‹1›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35页。

开半，前二开半为题跋页，末二开为白底洒金纸；另有二单页题跋夹于册中。墨纸缺字处有小楷墨书补书碑文，从题跋可知，为清王存善据李宗瀚旧藏所谓“唐拓本”对勘所录。全册共钤鉴藏印十枚。第一开钤朱文“顺治三年七月初二日钦赐大学士臣宋权恭记”、白文“权”、白文“牧仲父”、朱文“宋荦”、白文“宋炤之印”、朱文“包氏平生秘玩”、朱文“南海叶氏蕉田珍赏”；第十七开钤朱文“存善所得金石”；最末半开钤朱文“叶兆萼字香坪”与朱文“德畬审定”等印。

〔图四〕宋拓“赐本”《庙堂碑》册封面
故宫博物院藏



（二）递藏

墨纸首开所钤“顺治三年七月初二日钦赐大学士臣宋权恭记”楷书朱文印、其下钤白文篆书“权”字〔图五〕，是册中时代最早的收藏印。顺治三年（1646）七月初二日，皇帝因宋权‹1›、宋荦‹2›父子为巩固政权所作的贡献，赏赐了若干内府藏书画名品，此为其中之一，宋权特制此印。册后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宋葆淳跋亦述：“余生平所见书画法帖数种，皆用此钤记。盖所赐非一，故特刻此印，以纪一时之恩宠也。”〔图六〕有关此次赏赐及诸赐本与宋权所特制藏印，已有学者作过详述‹3›。

宋权以前的收藏痕迹虽然无存，但仍有线索可循。明董其昌曾言：“内府所藏大都无前人题跋，盖进御时剪去，恐有国讳，或不尽作庄语耳。”‹4›顺治初年的内府收藏多承自明内府，故多缺失明以前钤印、题跋与其他收藏痕迹。由此推知，这册拓本颇有可能为是明内府藏本。

墨纸首开另有宋权长子宋荦及三子宋炤‹5›的藏印，说明此本曾为宋氏两代人所藏。而商丘宋氏之后的主人，包世臣谓“溧阳史氏”‹6›。史氏之后，此册归包世臣收藏，首开墨纸钤其藏印“包氏平生珍玩”。包氏自述：“丙寅（1806）秋，得北宋拓南宋库装《庙堂碑》及枣版《阁帖》，冥心探索，见永兴书源于大令，

‹1› 宋权（1598—1652）字符平，号“雨恭”，又号“梁园”，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清史稿》有传。宋权有三子，长子宋荦、次子宋炤、三子宋炤。

‹2›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等职，加太子少师，清初著名鉴藏家、书画家。康熙皇帝曾赐予内府书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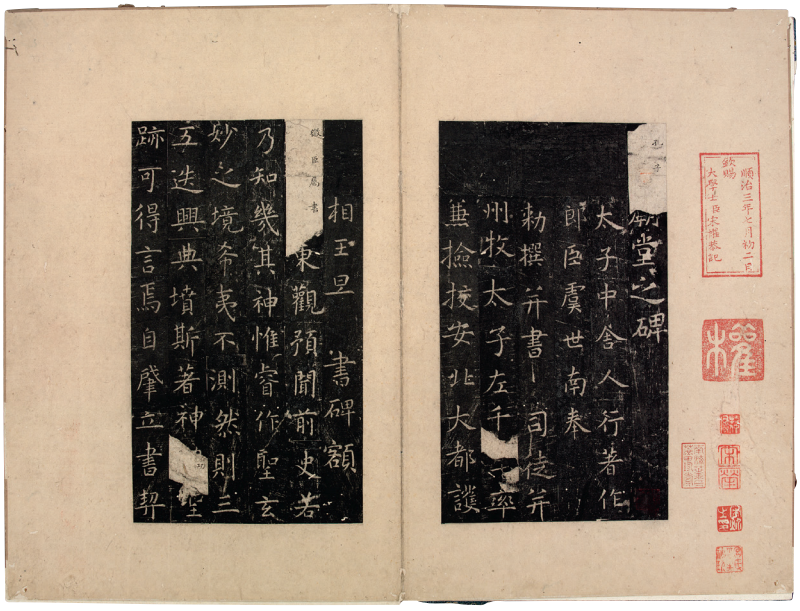
‹3›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9页；李振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道因法师碑赐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2期，第137—147页。

‹4› 见宋摹本《洛神赋图》卷后董其昌题跋，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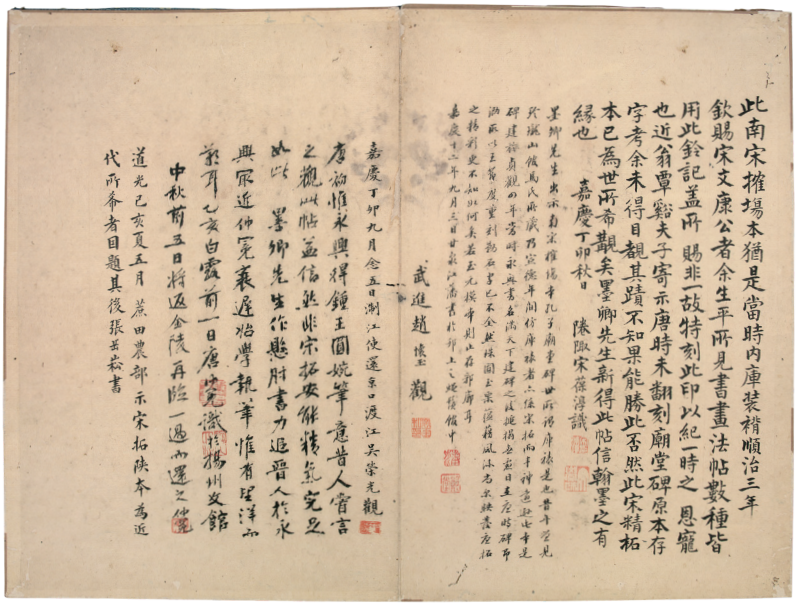
‹5› 宋炤（1643—1683），字介子，又字介山，号“然若”，清代河南商丘人，宋权之子、宋荦之弟。

‹6›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一），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2页。

〔图五〕首开墨纸



〔图六〕宋葆淳跋语



又深明大令与右军异法。”‹1›“余前得南宋库装王刻本北宋拓者，已足见永兴嗣法大令之血脉所在，后其本归闽中伊氏廿余年，思之不置。”‹2›

包世臣短暂收藏一年后，嘉庆十二年，是册再次易主，归于宁化伊氏。伊秉绶‹3›本没有在册中留下任何印记，但册后包世臣、宋葆淳、江藩、赵怀玉、吴荣光、姚鼐、孙星衍、唐仲冕等跋语观款均是在其收藏期间所书，跋语中也多次提到此为其藏本〔图七〕。

伊氏之后，本册为南海叶氏继藏。墨纸首开钤有叶应阳“南海叶氏蔗田珍赏”印‹4›及其子叶兆萼“叶兆萼字香坪”藏印。此时册后还有张岳崧书签、题跋，陈其锟、何溱、张维屏观款题跋，潘仕成钤“德舆审定”印等。

南海叶氏的继藏者为王存善‹5›。在他收藏期间，本册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大名品。20世纪初，上海有正书局以珂罗版印行于世〔图八〕。印册封面由有正书局创办人狄平子书签，原册外签则印于墨纸前扉页，册中印章题跋除王存善勘校附页外，悉数誊印，实价75元。

梁启超曾以此出版物对勘拓本，称：“此《庙堂碑》亦陕体之稍旧者，尝以与珂

‹1› 前揭（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二），第22页。

‹2› 前揭（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二），第64页。

‹3›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清史稿》有传。

‹4› 叶应阳，字树生，号蔗田，叶廷勋孙，叶梦龙侄，广东南海人。

‹5› 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近代著名藏书家。

罗复印件伊墨卿旧藏宋拓相校。神理尚不远，缺泐亦无多……”[1]《清稗类钞》也著录了这册王存善藏本：“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旧为宋牧仲、伊墨卿、叶蕉（田）所藏，后归寄青霞馆主人王子展观察存善，有包慎伯、孙渊如、姚姬传、张南山等诸题志，决为宋拓字体，刻画如新。”[2]叶昌炽[3]《缘督庐日记钞》在丙辰年（1916）有三条日记记述了他与这册《庙堂碑》拓本的翰墨因缘：

> 廿二日，王子展观察不见三十年，闻呜呜声则汽车在门矣，须鬓亦皓然如雪，神观矍铄则远胜羸躯也。[4]

> 廿五日，子展函来赠陕庙堂碑原拓库装，顺治三年以赐大学士宋权者，亦有宋牧仲印。[5]

> 十三日……知王子展观察作古，睹案头墨拓不胜人琴之感。[6]

王存善以此册相赠叶昌炽恐怕有双重含义，一则作为送给三十年阔别未见老友的见面礼；二则作为遗赠，将自己的珍藏至宝托付给惺惺相惜的学问家。

〔图七：1–2〕伊秉绶收藏期间诸家所题跋语



1



2

‹1› 梁启超《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七七，中华书局，1926年，第29A页。

‹2› 徐珂辑《清稗类钞》第三十一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3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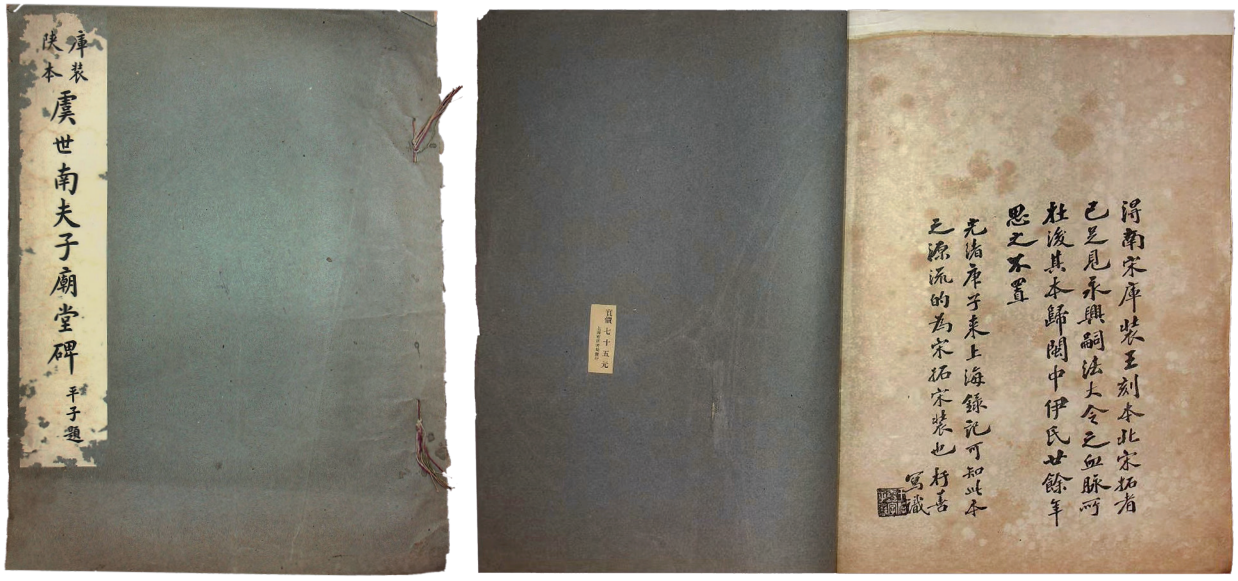
‹3›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又号缘督，自号缘督庐主人等，晚清著名金石学家。

‹4› 叶昌炽撰，王季烈编《缘督庐日记钞》（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77—478页。

‹5› 前揭叶昌炽撰，王季烈编《缘督庐日记钞》（第4册），第478页。

‹6› 前揭叶昌炽撰，王季烈编《缘督庐日记钞》（第4册），第534页。

〔图八〕珂罗版印刷品的封面与封底



然而，叶昌炽于次年逝世，此册再未有确切下落。直至1952年，民国收藏大家朱文钧[1]家属秉承其遗志，将此册捐献国家文物局。1956年，国家文物局将此册拨交予故宫博物院。

综上，清顺治三年，宋权获赐此明内府藏本，经宋氏、史氏家族收藏近一百六十年后，先后经包世臣、伊秉绶、南海叶氏递藏，1900年转王存善后在沪上影印出版，名声大噪。1917年后，此册转归叶昌炽和朱翼盦收藏。现藏故宫博物院。

（三）断代、考据与版本特色

以下根据装裱、缺损字等客观现象，对本册的捶拓年代进行考证。

1. 装裱

从宋权等清初人钤印保存情况看，本册保存了颁赐时的装帧形式：长方开本，天地头、分心与大边皆宽大。册中墨纸与装裱均有旧修补，从修补痕迹看，应是将开身打开、墨纸揭裱后，将虫蛀的位置衬纸加固，每一处修补均十分精细〔图九〕。撞边的破坏恐因修复墨纸与开身所致。精心的递藏与细致的修复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拓本及其装裱的原貌。包世臣在跋语中称其为“南宋榷场本，尤是当时内库装裱”。结合上文所述递藏情况，笔者认为该册的装裱时间下限不晚于明代内府收藏之时。

2. 缺损字情况与考据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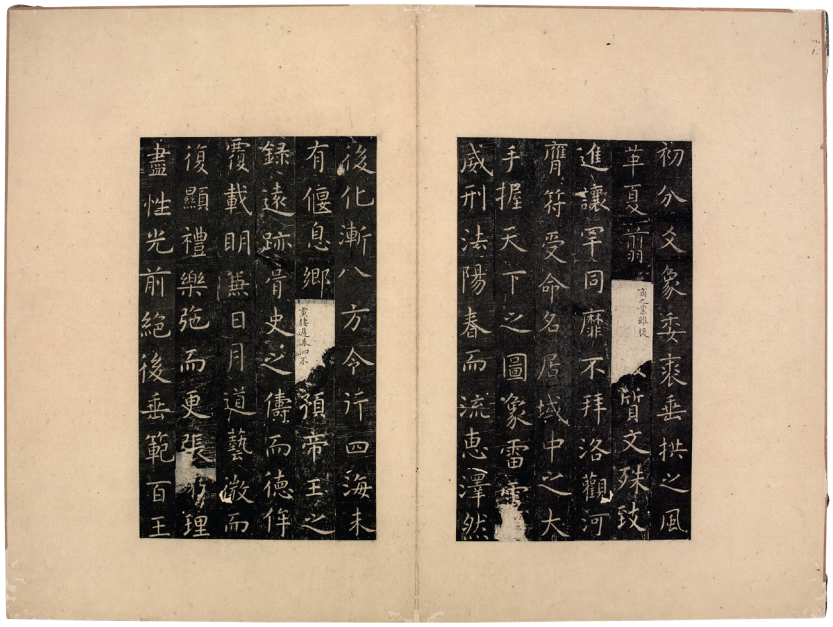
通过对照清李宗瀚旧藏所谓“临川四宝”之一唐拓《孔子庙堂碑》册，参考本册中王存善校碑笔记〔图十〕，可知本册墨纸缺字共计147个，存半字（存数划但不可释读的字）23个。本册拓本剪条装裱时保留

‹1› 朱翼盦（1882—1937），名文钧，字幼平，号翼盦，浙江萧山人。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即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

了碑石缺损字的空白部分，笔者以西安碑林博物馆官网上公布的20世纪50年代修复后的碑之整幅拓本为底〔图十一〕[1]，将本册剪条墨纸重新拼合出一幅整碑拓本后〔图十二〕，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墨纸拓制时，碑已为三段。主要的贯通裂纹有两道。右上一道横裂纹自第一至二十四行，每行缺一至七字不等。最右侧较宽，至碑文第八行渐窄，再至第十七行又渐宽，又至第二十四行渐窄，后与下部的另一道横向裂纹相连。右下横裂纹自第一至二十四行，碑文第十一至十三行处最宽，每行缺三字，其余行均缺一至二字。两条横裂纹交汇于碑文第二十五行至三十二行，形成碑文最大一处缺损，行缺四至八字，其中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行，每行缺八字。第三十二行始，裂纹渐细，第三十三行仅损一字，第三十四行几乎没有伤及字口，第三十五行王彦超刻款完整。从剪条痕迹判断，靠下的横贯裂纹第二行“千牛”，第三行“神功圣迹”缺损处墨纸相连，未被剪断，故不能判断碑当时是否已经折断成三个部分，可能是裂纹尚浅碑未断，亦有可能是断后续为一体。第三十二行“率繇王道”间无石花，墨纸连贯，故此处拓时未断。第三十二行至碑最左，由于碑文无缺字，又因剪裱，不能判断是否在无字处有石花。此本的横贯裂纹

〔图九〕拓本内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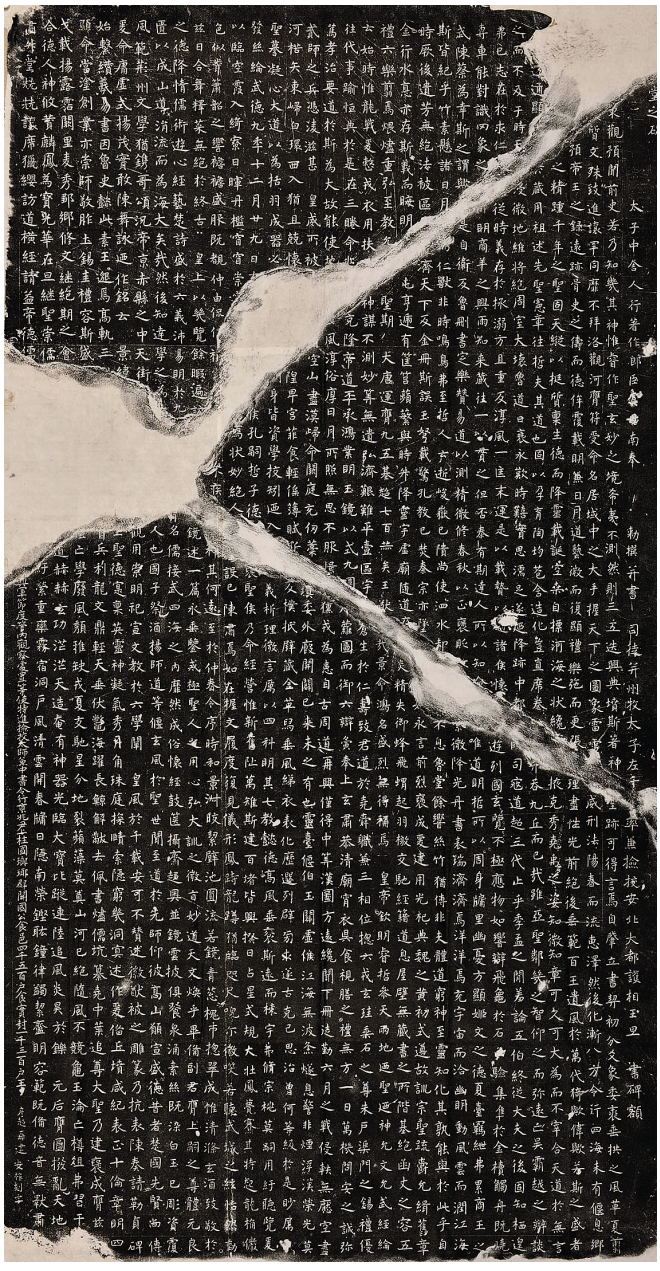


〔图十〕本册后王存善校碑笔记



‹1› 将宋拓剪裱本上的碑文逐字对应到此整幅拓本上。

〔图十一〕原碑近拓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图十二〕“赐本”拼合后的整碑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高度小于目前原碑的裂纹高度，特别是靠下的裂纹，碑之现状与此拓本相比，宽了一个字的高度有余〔图十三，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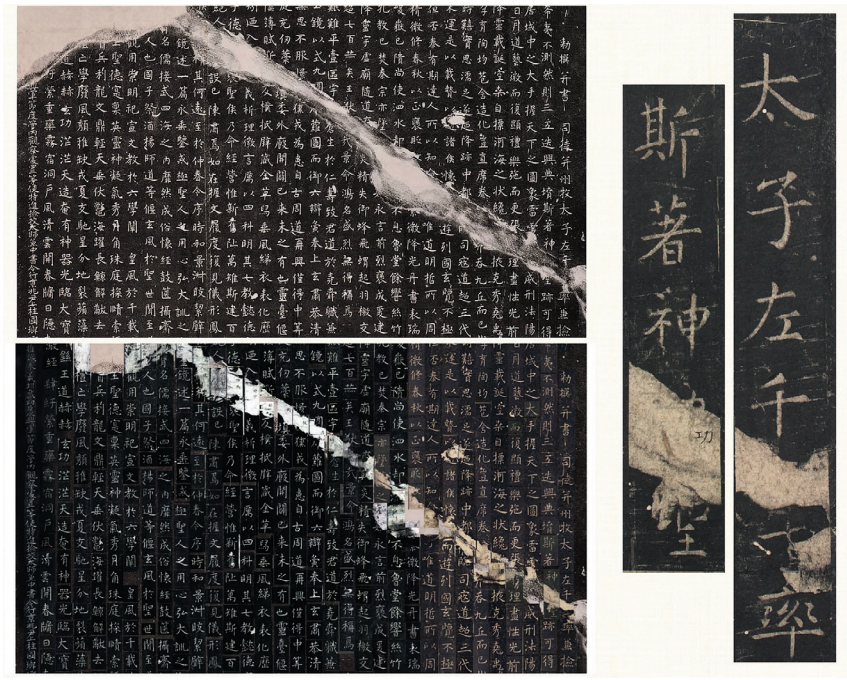
其次，马子云《碑帖鉴定》、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都有关于此碑宋拓本的鉴定意见，综合而言，马子云与张彦生均认为此碑有可信之宋拓。本册符合马子云关于该碑南宋拓本的鉴定意见‹1›，即二行“奉敕撰并书”五字未损，末行“帝德儒风，永宣金石”与后“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均

‹1› 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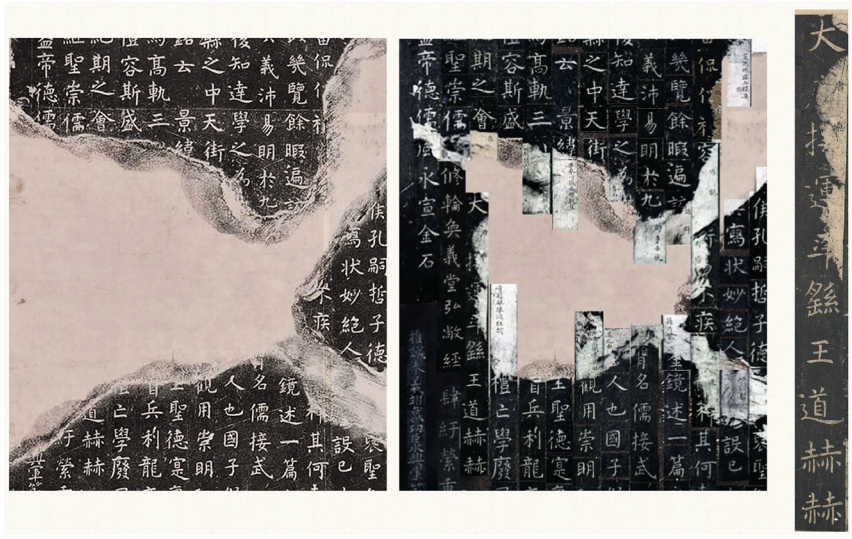
未损泐；亦符合张彦生所言：“所传断后拓，以二行‘虞世南’，‘虞世’二字完好为宋拓本，或称北宋拓。”[1] 王壮弘虽认为此碑无宋拓，但以二行“虞世”二字完好为早本[2]，亦与本册符合。

再者，通过比较以此本复原的整幅拓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整幅拓本与西安碑林博物馆官网公布的今碑整幅拓本之图像，结合前述文献考证，笔者认为此碑很早便已断折损坏，此后的数百年间整体面貌变化不大。但在经历关中地震后，碑石出现明显变化，最为显著者见于清初整幅拓本[3]中碑最左侧中部最末四行，比赐本少了大约三十字。此外，从宋至清，碑石两道主裂纹缓慢增大、明显变宽了，但多不伤及字口〔图十五〕。晚拓本比早拓本新增的石花中，伤及碑文字口的，可清晰辨出。在碑的主裂纹以外，正如前辈学者所言，“虞世南奉敕撰”等处在早晚拓本中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别〔图十六〕。

〔图十三〕“赐本”碑文第二行、第三行靠下裂纹复原与原碑近拓图像对比



〔图十四〕“赐本”碑文第三十二行“率繇王道”间无石花，将该行复原至整幅拓本中与原碑近拓图像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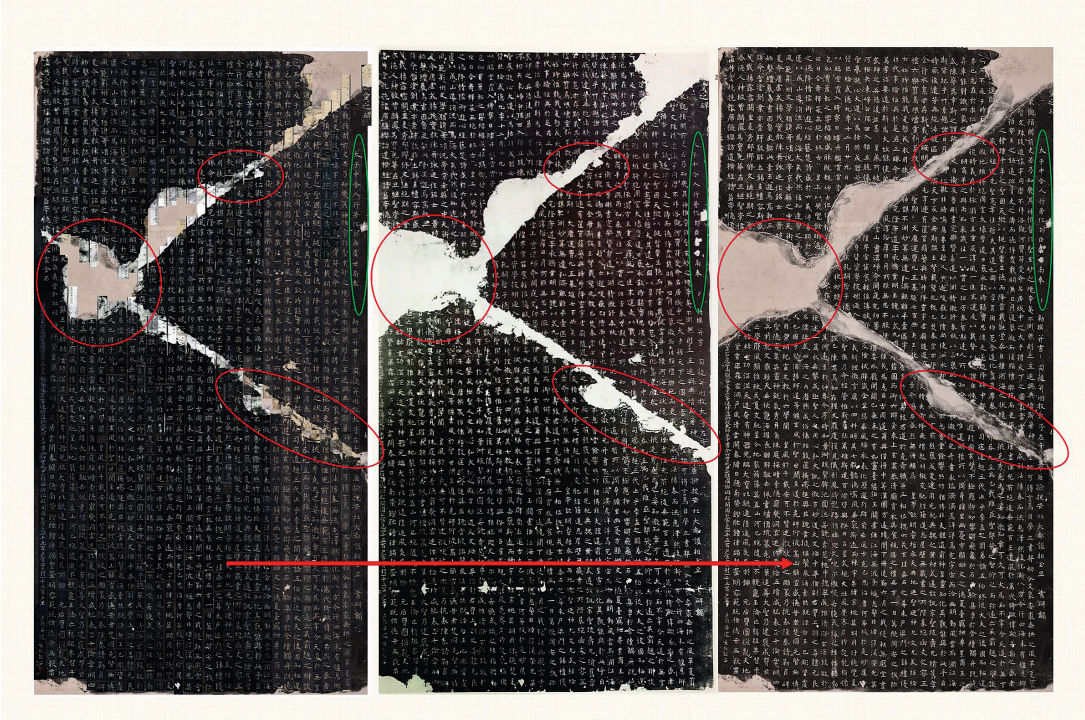
笔者选取故宫博物院藏该碑宋、明、清诸拓本，再次进行对勘，从中可见早晚拓本的差异。第十四行“晦明匪一”之“匪”，时间较早的赐本存字的上半部分，笔画分明、字口清晰。明拓本中逐渐显现出更多的泐痕，笔画走形，至清初拓已不再出

‹1›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95页。

‹2›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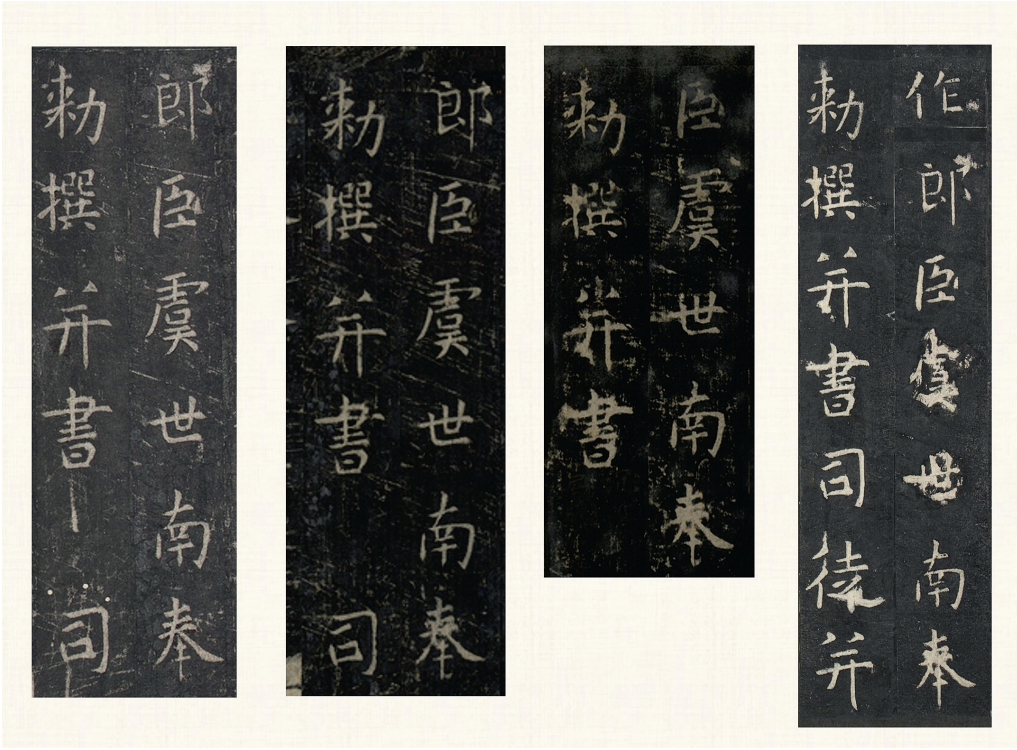
‹3› 胡海帆、汤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图十五〕**碑自宋至今的损毁过程**
两条主裂纹区域和裂纹以外的部分均可见碑石随时间加剧残损的变化
1. 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复原图　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整幅拓本　3.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原碑近拓



1　　2　　3

〔图十六〕**“虞世南奉敕撰”在宋至清拓本中的变化**
故宫博物院藏
1. 宋拓本（赐本）　2. 宋拓晚本　3. 明初拓本　4. 清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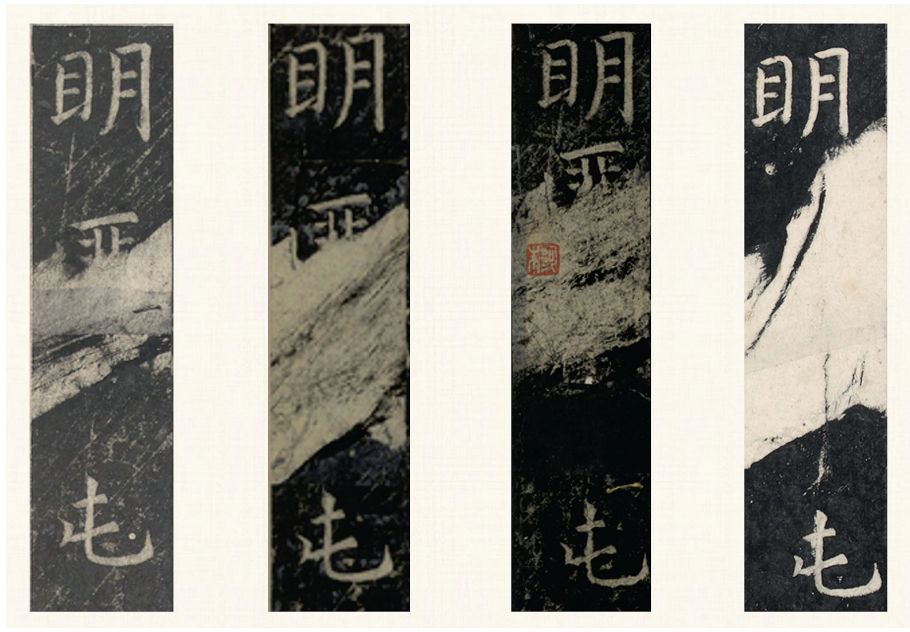
1　　2　　3　　4

现该字〔图十七〕。类似的情况如第二行“雷电”之“电”，第三行“穷理尽性”之“穷”，第七行“遂通显至仁”之“遂”与“显”，第三十四行“侃侃礼容”之“容”〔图十八至图二十〕，这些字都位于主裂纹处，晚拓本较早拓本字形损泐变化十分明显。此外，赐本王彦超款“太师兼中书令”中“师”与“兼”书写连笔牵丝分明，与其他诸本仅见字形并不相类〔图二十一〕。

第四，除赐本外，号为“宋拓”的“陕本”《庙堂碑》另有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藏本、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程瑶田旧藏本、上海博物馆藏龚心钊旧藏清内府本、上海图书馆藏庞泽銮旧藏本等。笔者排比校勘，认为以上诸本考据相类，传拓时代相近。而赐本拓工更精、石花更小、字口分明，为其中最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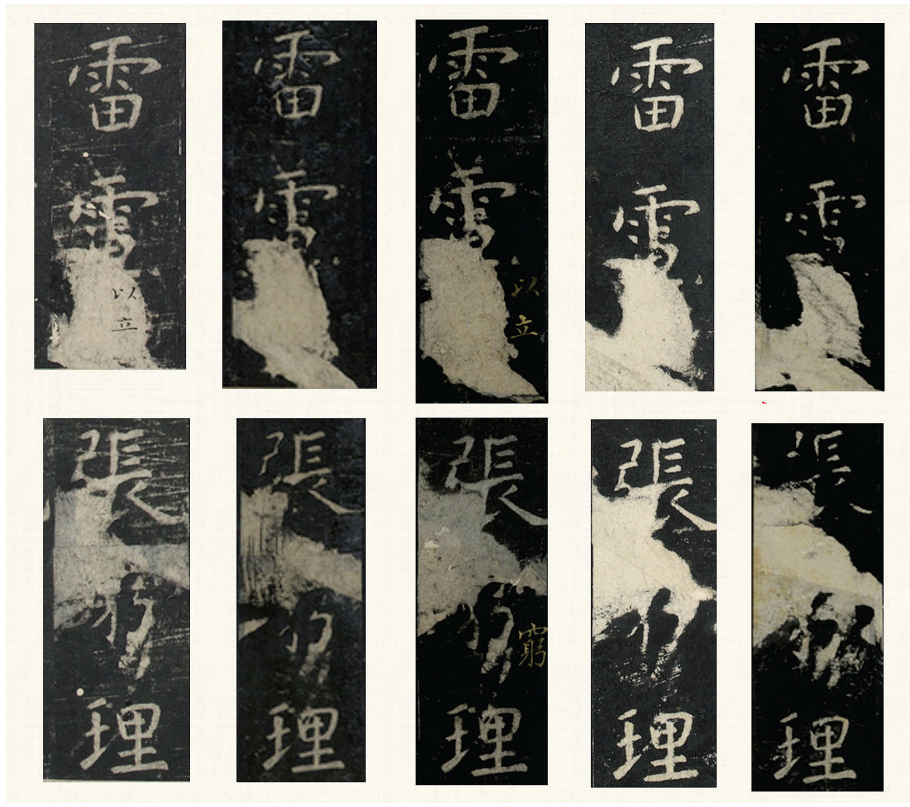
另，张彦生称上

〔图十七〕“晦明匪一”之“匪”在宋至清拓本中的变化
1. 宋拓本（赐本） 2. 宋拓晚本 3. 明初拓本 4. 清初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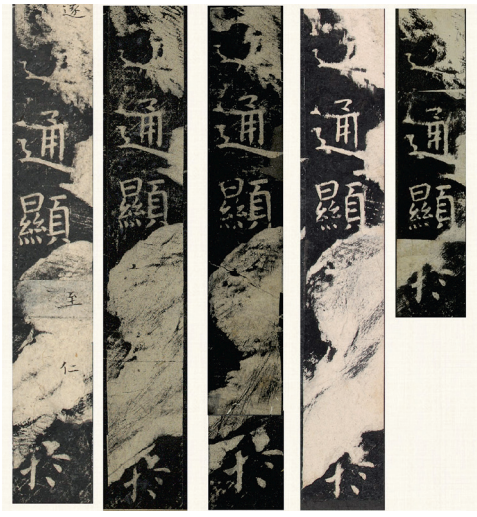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十八〕“雷电”之“电”、第三行“穷理尽性”之“穷”在宋至清拓本中的变化
1. 宋拓本（赐本） 2. 宋拓晚本 3. 明初拓本 4. 清初拓本 5. 清拓本



1 2 3 4 5

〔图十九〕“遂通显至仁”之“遂”与“显”在宋至清拓本中的变化
1. 宋拓本（赐本） 2. 宋拓晚本 3. 明初拓本
4. 清初拓本 5. 清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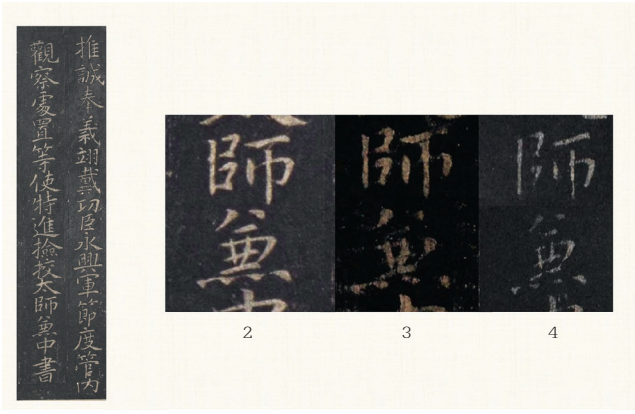
1 2 3 4 5

〔图二十〕“侃侃礼容”之“容”在宋至清拓本中的变化
1. 宋拓本（赐本） 2. 宋拓晚本 3. 明初拓本
4. 清初拓本 5. 清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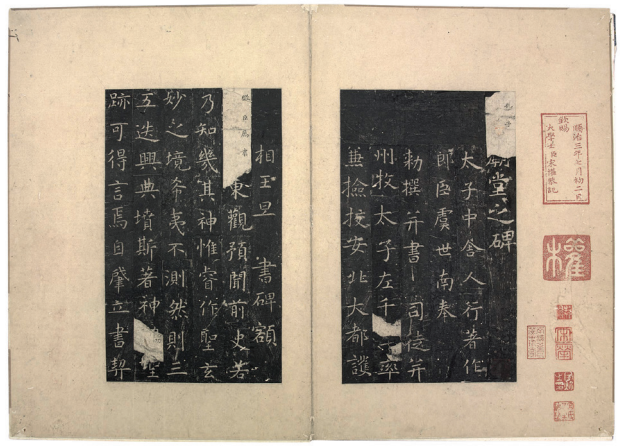
1 2 3 4 5

〔图二十一〕“赐本”王彦超刻款较其他该碑宋本细节更胜
1. 故宫博物院藏赐本王彦超刻款 2. 故宫博物院藏赐本刻款局部
3. 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刻款局部 4.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宋本刻款局部



1 2 3 4

〔图二十二〕装裱、墨纸尺寸及行款状况
1. 故宫博物院藏赐本
2. 上海博物馆藏宋拓“陕本”《庙堂碑》册



1



2

海博物馆藏本为宋装[1]，不知依据为何。上博本装裱、剪条行款与故宫博物院藏赐本及另一清内府本完全一样，内外尺寸差别仅毫厘间，据此推断，这些藏本的装裱时间应属同期，均系清内府承接自明内府的藏本〔图二十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另一顺治帝赐宋权

‹1› 前揭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95页。

的碑帖《宋拓道因法师碑》册[1]，虽然碑文内容完全不同，但其装裱风格、内外尺寸与赐本几乎相同。另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拓宋装”《大智禅师碑》册、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宋装”《孔子庙堂碑》册、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旧藏《孔子庙堂碑》册等[表二]。这些传世善本信息、图像的进一步公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获取直接证据，或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通过排比与分析，更加明确地对宋、元、明内府的碑帖装裱进行考证与判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表二]“库装本”装池对照表

序号	著录名称	收藏机构	装裱尺寸（整开） 单位：厘米		墨纸尺寸（半开） 单位：厘米	
			纵	横	纵	横
1	宋拓宋装《大智禅师碑》册	中国国家图书馆	42.5	57	29.5	17.5
2	宋拓《孔子庙堂碑》册（清初赐本）	故宫博物院	42.5	56.5	28.5	16.3
3	宋拓《孔子庙堂碑》册 （清内府藏本）	故宫博物院	42.5	56.5	28.5	16.3
4	宋拓宋装《孔子庙堂碑》册（清内府藏本）	上海博物馆	43	57.4	30	17.3
5	宋拓宋装《道因法师碑》册（清初赐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	43	60	28.6	16.8

综上，笔者认为此册为明内府旧藏库装南宋拓本，且捶拓精良，流传有序，经名家鉴跋，与国内目前已知该碑宋本相较，年代最早，弥足珍贵。

四　余论

首先，本文详细梳理了历代关于“陕本”《庙堂碑》历史沿革的文献，提出了《荥阳外史集》中有明确纪年证明碑已为“三段石”的新证据，可由此更新与回溯该碑早期拓本的断代问题。长期以来，学者或以该碑所传拓本皆断本，并结合碑断于明嘉靖乙卯（1556）关中大地震的推测，否认该碑有明以前拓本的存在。但新证据表明，入明以前该碑已有“三段石”的俗称，而从常识判断，在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战乱纷争不断的古代，文献记录的滞后是客观规律，也是普遍事实。其差距，少则几年，多则数十年，甚至更长，并不鲜见。这与该碑有宋拓传世的传统鉴定意见并不矛盾。

其次，嘉靖乙卯大地震并不能成为拓本断代的硬标准。就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汉唐碑刻而言，特别是经由唐末五代至宋朝入藏的传世名碑，不论是京兆府府学与文庙的屡次迁址与整修，政权的更替与朝代的变更，抑或石质不坚、捶拓过度，都有可能是碑石断损残折的原因。一些碑刻早在明代嘉靖关中大地震前，就已经“缺裂不完”了。不仅此碑如此，1973年整修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石台孝经》时，在碑座发现的金代拓整幅《集王圣教序记》也呈现出明显的贯通横裂纹，传世的宋拓《玄秘塔碑》亦皆为断本。

‹1› 前揭李振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道因法师碑赐本〉研究》。

再者，就本册拓本而言，其拓工、考据乃至递藏经历皆有精彩之处。特别是作为清初皇帝赐本，其装裱形式可作为明内府旧藏碑帖的标准本，为碑帖的装裱鉴定提供参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另一顺治帝赐宋权碑帖——宋拓《道因法师碑》册[1]，虽然碑文内容完全不同，但其装裱和墨纸尺寸与本册差别极小，应该不是巧合。与本册装裱风格、内外尺寸几乎相同的，亦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拓宋装《大智禅师碑》册、上海博物馆藏宋拓宋装《孔子庙堂碑》册、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旧藏《孔子庙堂碑》册等[见表二]。由此看来，包世臣将此册追溯至南宋内库装裱不无道理。这些拓本的尺寸数据为长期无法量化的碑帖“库装”装裱，提供了依据。

最后，关于“陕本”《庙堂碑》的早期拓本，目前已知五册宋拓本中的三册曾入藏清宫，而此三册的装裱与行款又几乎一致，相信应都是继承自明内府。明、清宫廷在此种碑刻的收藏中，又有诸多早拓善本的复本，正是由于其长时间深藏内府、秘不示人，故得以传承至今。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盛　洁）

‹1› 前揭李振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道因法师碑赐本〉研究》。